

# 梁啓超在民國初年的師友關係

張朋園

中國的傳統社會中，人際關係最爲複雜。除了親屬關係之外，要算師生、同學、同年關係。（註一）在轉型時期的民國初年，此種情形繼續存在，老師影響學生，同學影響同學。（註二）但由於時代的變遷，青出於藍，學生往往有反過來影響老師者；或老師守舊，學生超越，有師生不得分道揚鑣者。惟時代儘管變遷，若干傳統的習慣與觀念，一時仍不能完全擺脫，如師生情分之不可背，同學情誼之不能不提攜。因此，人際關係在某種情況下是一種負擔，在心理上是一個累墜，欲進不能，欲退不得。社會政治隨之亦受影響。此爲轉型時期的一種特色，處其世者，無可如何。

梁啓超的遭遇正是如此。在他的上面有其師康有爲，與他平行的，有其萬木草堂的一批同學，他自己也是桃李滿天下的爲人師者。他的學生中人才輩出，各有專業方面的成就和影響力。因此，上何以事師，下何以待弟，這一個環繞着他的師友關係，構成了他個人成敗的因素之一。本文僅選擇其師康有爲，其弟蔣方震、張君勱、張東蓀等諸人爲討論範圍，萬木草堂的同學亦略加敘述，這是梁氏個人生活的一面，亦可作爲民國初年人際關係的舉例。

## 一、康梁異趨與萬木同學之累

（一）康有爲

民國十六年康有爲（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七十誕辰，梁啓超邀約當年萬木草堂的同學爲康氏祝嘏。在那一篇洋洋灑灑的壽序中，說他們在萬木草堂受業的種種樂趣，引孔子的話：「智者樂、仁者壽」，讚康氏既「仁且智、故樂壽」，絕然看不出康、梁師生間過去有絲毫的分歧。（註三）不久康氏逝世。梁又爲文祭之，言及民國六年的復辟之事，謂「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漫應」，但仍極稱讚康氏「丈夫立身，各有所本」，各行其是，「貞松不以歲寒改性，斯正吾師之所以大過人」。（註四）

梁啓超與康有爲在政治上的結合，由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除了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三年，因梁之提倡革命與康氏有所不和外，大體上他們是一致的。尤其是梁棄民主革命而君主立憲以後，師徒唱合，搭配得天衣無縫。（註五）甚至於到了武昌革命發生，仍與康互相呼應，要求中國採行英國的立憲政體。（註六）故在清季，康梁相提併論，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康、梁到了民國，已非復一個集團，凡是稍具常識的人，都應該有此認識。（註七）

梁啓超與康氏正式分手，丁文江謂在民國元年四、五月間，他在梁任公先生年譜中說：

「〔元年〕四、五月間，先生〔指梁啓超〕有請南海〔指康有爲〕宣布退隱之議。此事南海似已同意，惟麥孺博〔孟華〕氏反對最力。此時各方面攻擊保皇派甚烈，大概是爲緩和各派的攻擊，才有此議。可是先生和南海分途，就從這時起始了。」（註八）此一看法大體是正確的。十月十日武昌革命爆發，梁氏旋於十一月六日自日本取道大連入奉天，以「和衷〔世凱〕慰革〔命黨〕、逼滿服漢」八字爲方針，（註九）欲與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等人取得聯繫，達成控制北京宣布君主立憲之目的。（註十）不幸因吳祿貞被刺，傳言藍天蔚將對其不利，不得不折返日本，放棄原定的計劃。

不能起而行，唯有坐而言。梁氏返抵日本之後，附和康有爲的「虛君共和」主張，希望滿清逼於革命形勢，宣布君主立憲。豈料革命已成之勢，全國趨向民主共和，虛君之說，旋成過去。

及共和大勢決定之後，他不僅消極的放棄了虛君立憲的想法，且轉變爲積極的擁護共和者。對於康有爲固執不變的態度，甚不以爲然。清帝遜位前夕，康曾致梁一函，示意「聯鑣驟斬，同拯日〔指清廷〕於虞淵。」（註十一）梁氏作答，表示決不再爲「虛君共和」這一個緣木求魚的想法去與袁世凱、北方軍人及各省督撫周旋，更不屑與那些羊狼狼貪的滿清親貴相合作。他勸康改變態度，擁護共和，「藉連鷄之勢，或享〔寨翁〕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途。」如若不然，「趨舍異路，愴恨何言！」只好各行其是。在這封向未公開的親筆函中，梁氏的表示是十分嚴肅的。（註十二）

梁啓超與康氏分道異趨的原因很多，他自己亦嘗加以檢討。第一是康氏的爲人過於武斷而且主觀。他說：

「有爲之爲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所

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在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亦在此」。(註十三)  
言下之意，自己不如此。第二，康氏太有成見，自己太無成見：

「啓超與康有爲最相反之一點，有爲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有爲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啓超則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旁皇求索中。」(註十四)

由於主觀與客觀之不同，成見有無之不同，他們的思想由極小的差異變爲極大的分野。例如「三世之義」，梁從康學得之，但康「主進小康」，梁則「欲進大同」。(註十五)此一關鍵構成了一個能接受民主政治，一個則緊守君主立憲。一個以「僞經」、「改制」起家，一個三十以後不再談「僞經」、「改制」。康、梁已是兩個學派，(註十六)分手勢屬必然。

康、梁異途而趨，維新黨內部的變化也有關係。革命發生後，黨內一部份人士便開始反對康有爲的主張，認爲其虛君共和見解「偏僻迂謬，不切時勢，萬無附從之理。」(註十七)他們紛函梁氏，促其「各樹一幟，各行其是；」要他不必屈於康之「專制阻格」，不必委曲求全。(註十八)

就實際的需要而言，康、梁勢必分手。蓋服從康氏，則必須反對民主共和。既反對民主共和，在民國即不能與政權接近。此不僅梁氏不願，即黨內多數人士亦所不願。南北議和大局決定後，很多人都主張公開擁護共和，立即回國組織政黨，在政治上佔一份勢力，大家都有出路，否則時過境遷，「他日將無吾輩跼足地矣！」(註十九)

梁啓超議請康有爲退隱，或許是維新黨多數人的意見，因爲此時梁已宣布擁護共和，而康氏依然堅持故見。如不退隱，於梁等之歸國活動多所不便。但是麥孟華則認爲康、梁「盡可分道而行，不可爲張皇之舉動。」(註二十)徐勤亦曰：「起點既異，必無再合之理，」(註二十一)亦反對公開分手。這一曖昧的處置，形成了此後藕斷絲連的關係。

這一個藕斷絲連的關係，當然不能再範圍梁的行動。惟康、梁真正異途而趨，涇渭之分，要到復辟以後。民國四年，梁南下討袁，過上海，禮貌上不能不讓康氏知道此行的目的。因遣同門湯敦往謁。康氏嘉許之餘，提出了他的復辟主張。此一違背時代的思想，當時頗出梁的意料。因感受甚深，有所記載：

「〔南下討袁〕最費躊躇者，則告南海先生與否也：仍使覺頓〔湯毅〕往謁將意，南海深嘉許，固在意中，然有意外者，則正色大聲疾呼以主張其平昔之復辟論也。且謂吾輩若不相從，從此恐成敵國。其言甚長而厲，覺頓咋舌，唯唯而已。」（註二十一）

果然在袁氏取消帝制之後，康有為便公開了他的復辟主張。五年四月四日，上海周報刊其「為國家壽安定策者」之復辟議。梁氏既為共和奮鬥，當然不能嘿嘿，即於五月五日刊「闢復辟論」于時事新報，對康公開掙擊，中有「吾既驚其顏之厚，而轉不測其居心之何等」語（註二十三），意謂康於壽安會時不出面為故君請命，而在護國軍戰勝袁氏之後才來收漁人之利。

民國六年，康有為與張勳實行復辟，梁啓超則說段祺瑞舉兵討伐，檄文中「貪得無厭之武夫，大言不慚之書生」，即指張勳與康有為而言，（註二十四）無異與康正式絕裂。因此有人謂：「足下上馬草檄，誠為文士得意之筆，然昔日庾公之期於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於夫子。今令師南海先生從龍新朝，而足下露布討賊，不為令師留絲毫地步，其於師弟之誼何？」梁則義正詞嚴的說：「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註二十五）此正是時代變遷中，守舊與進取之明顯對照，也是門弟子超越業師的實例。

康、梁因思想上的異趣，元年至五年之間維持貌合神離的關係，六年復辟之役各行其是。復辟失敗，康賦詩洩憤，痛詆梁氏。其詩云：「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潛潛。」（註二十六）指責梁違背倫常，禽獸不如！以後梁有所主張，康則作公然之反對。例如歐戰之對德問題，梁氏力主絕交宣戰，康則反駁以為不可。梁氏倡導聯省自治，康又指為「亡國之言」（註二十七）

以上為康、梁民國關係的梗概。雖然師生之間因思想上的南轅北轍，絕裂至此地步，但梁氏並未斬斷其康門關係。他盡可以公然反對其師，然仍不能不照應其萬木草堂的同窗學友。這是康、梁關係的另一面。

## （二）萬木草堂同學

梁啓超與萬木草堂的同學，一方面得他們的幫助，一方面受他們的拖累，而拖累甚於幫助。

康有爲主持下的萬木草堂，（註二十八）受業者數十人。他的傳授與舊式的書院固然有所不同，但大體上仍然不能脫出傳統的儒家模型的塑造。雖然講求經世致用，但對於逐漸興起的西方政治、經濟、法律等諸種專門知識，康氏所知有限，傳授自亦有限。在此種情況下培植出來的人才，多爲通才，而非專才。一旦置身於業已漸次興起的專門事業機構中，自然是不甚相宜。

舉例而言，康門中極受人稱道的麥孟華（一八七四——一九一五），便因缺少一種專長，以至於在民國之世，僅能做他人之幕友，（註二十九）而未嘗獨當一面。（註三十）鬱鬱而不得志，常常以酒澆愁，就這樣糟蹋了自己，民國四年一醉而逝。（註三十一）梁、麥爲「忘形之交」，他們在萬木草堂同學時，「鑽穴名理門邃密，講析文史擅芳菁，」同出同進；時而月夜登山，時而泛舟江面。在梁氏流亡十四年的生涯中，他們不時聚首。在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等雜誌中，麥亦不時有議論性的文字。但其專精不如湯叡，廣博不如梁氏。下面一函，是梁啓超於民國前二年致麥者，不僅可以看出當時麥的心情已鬱悶不展，同時暴露了康門欠缺專門之學的缺點：

「吾二人之相愛，根於天性，良莫知其由然，故責善之言，亦不覺其過當。實則以吾弟根器之厚，豈至如前所云云。」大概他們二人在此之前已有所討論：「吾輩十年來，徇物太甚，馳逐不可必得之業，而欲羨憂戚，遂日與之相乘，習之既久，視爲固然，雖自問初志本在用世，而役役於得失，已漸夷爲流俗之人而不自察矣！嘗歎古豪傑之士所以無不入而自得者，彼誠有所自得故也。孟子釋自得之義曰：『居之安而資之深』，吾輩之於學未有一專、能安、而深者，是即未嘗自得之效也。……吾輩所生之時，與宋、明異，諸儒陳義單簡，不足以盡副營養之所需：一旦厭倦，將有舍而去之一日，則益蕩然無復立場矣！……今之時勢與古異。古之管、葛莫不具有時代之常識。欲爲今之管、葛，而於今時之常識有一不具，得乎？吾輩自問則何如？若至待其時而然後學之，安有此事。今方終日宴居，猶不能好學深思，以求其意，而謂當遣大投艱之時，反有力以及此，直自欺耳。然則及其時至，勢不能自淪於今之哀哀諸公而不止也。……今吾弟受病之原有二、一曰太閒，二曰將來之命運懸於人手，有所待而不自決。閒故懂擾，有所待故蹉跎不振。治本之法，當絕所待，治標之法，當使勿閒。……若夫求學之途徑，則自審固亦有足爲我弟嚮導者，然甚纖屑，終非楮墨所可罄。若能來此同居一二月，同讀數書，則所以助弟興味必不歉。」（註三十二）

同門中人才如此，能見用者當然有限。

民國肇建，同門中多促梁啓超早日歸國，一旦梁氏出任閣員，大家都可跟進，得一官半職，在政治上佔一份勢力。果然梁於二年七月出長司法，萬木同學多以爲時機已至，紛紛前來要求有所位置，弄得梁無法應付，不得不發表告鄉中父老書，謝絕請託。（註三十三）

這時康有爲亦加以壓力，要求安插萬木同學。梁明知同門中的缺點，亦不得不盡力爲之。如徐勤（康氏最忠實的弟子）、唐才質均放爲駐外使領，伍莊任爲廣東潮州州尹，羅普爲廣東實業司長，麥仲華爲廣東電報局長，張學璟、麥仲華先後爲廣東高等檢察廳檢察長，其他如李福基、韋紹泉等均有所安插。（註三十四）

但是不得安插者，大有人在，如馮紫珊等然。康有爲極爲不滿，進而加以責備。梁氏深感不耐，對康說：「須知吾非總統，（即總統亦不能干預各部用人權）豈能爲所欲爲。」又說：「若任意以同門一人充之，吾今日早已身敗名裂矣！」「保荐一人，亦當量其人才力所能逮，庶不授人口實。」「弟子今日出山，果以荐用黨人爲唯一之職志耶？今日荐甲以去就爭，明日荐乙又以去就爭，其人之才器果皆有值得以去就爭耶？」「以今日辦事之難，而我黨經驗缺乏如此。愈居高位握重權，則授人以可攻之隙，本人固一蹶不振，而中央政局亦受牽動，致使弟子以後不復能用一人耳。」「他人可以不顧名譽，我能尤而效之耶？」（註三十五）

當時康有爲加給梁最大的壓力，是要求以徐勤爲廣東省的民政長（即省長），並提高伍莊的位置。廣東原爲國民黨的勢力範圍。自二次革命之後，胡漢民去職，袁世凱以龍濟光爲都督，控制了全省。而康有爲則認爲軍政歸袁，民政當歸其黨，故促梁以去就爭徐勤之民政長和提高伍莊的地位。但梁認爲這是辦不到的事。即使辦得到，廣東情形複雜，徐勤亦未必幹得下去。他說：

「即如以去就爭勉（徐勤字君勉）爲粵長，弟子敢謂其決無價值，勉亦自謂無價值。勉果能了粵事耶？稍知其事，必不敢如此大言矣！」（註三十六）

徐勤的問題未能解決，只有將伍莊的位置略爲提高，由潮州州尹升爲內務司長，（註三十七）聊塞康氏的責備。但上任不過一月，「謗出盈篋」，被牽連的人很多，連徐勤的老位置亦幾不保。（註三十八）

舊日的傳統，「一朝天子一朝臣」。梁啓超做了司法總長，雖力圖有所作爲，然這一個舊傳統的關係給予他的壓力，實是不

勝負荷。「一面須用萬木人才，一面須用進步〔黨〕人才，」數月之間，「所荐用者亦不爲少」，而人人皆抱非分之想，以相要求；要求不遂，立即反唇。「其師如此，其他可知。袁世凱冷眼旁觀，必然冷笑，所謂新人物者，其能擺脫傳統者幾希！梁在袁的眼中，當然要大打折扣。其所以無大作爲，萬木同學的拖累，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萬木當然並非絕無人才，對梁亦非絕無幫助。在海珠事變中死難的湯叡，就是一個好例子。惟僅此而已。然而湯叡之能在財經方面有所成就，並非得自萬木草堂，而是在梁的薰陶下磨練出來的。

湯叡（一八七八——一九一六）字覺頓，一八九四始入萬木草堂就讀，較梁啓超晚了四年。湯氏在草堂爲時兩年，一八九六與徐勤同入東京大同學校任教。（註三十九）戊戌政變梁氏亡走日本，二人再度聚首，過從甚密。湯問學於梁達十年之久，尤其光宣之間，二人同居，砥勵切磋，最有進步。雖然情同手足，而學行界於師友之間。（註四十）湯氏之成就，以理財著稱。民國元年，梁藉湯與袁世凱聯絡，其推荐書云：「其人有肝膽而達於事理，治事之才，過於啓超十倍。專治經濟學，明體而達用，銀行貨幣尤爲專門。」（註四十一）所著文字，凡刊於新民叢報、國風報之署名覺頓、明水、茶圃、湯朝輔者均屬之。宣統三年，湯氏歸國，任大清銀行顧問官，僅一月而革命起。民國二年出任中國銀行副總裁，旋升爲總裁。（註四十二）袁氏稱帝，湯與梁南下從事反袁運動，不幸於海珠事變中死難。湯氏理財之學，不僅受梁稱道，時人亦多推崇。張一麀謂：「使君理財吾國，其庶有多耶！」又謂其「學術之淵深，性情之篤厚，同輩無不斂手」。（註四十三）

護國軍之勝利，梁啓超與蔡鍔的關係最大。（註四十四）而反袁大計的決定，湯爲積極的主張者。（註四十五）梁在兩廣的作爲，湯協助之力尤不可少。五年三月梁入廣西與陸榮廷合作討袁，遣湯氏先行。湯抵南寧轉述梁維護共和的理想，並告知正取道海防入桂的消息。陸榮廷不待梁氏抵達，即宣布了廣西之獨立，湯氏外交之才可見，蓋梁的聲望雖赫赫在人耳目，與陸榮廷並無私交。湯氏銜命先至，取得了陸的信任，是關鍵之一。四月六日湯又肩負陸榮廷與梁的意思前往廣東說龍濟光反正。不料龍氏首鼠兩端，不待湯氏展其蘇張之才，竟於海珠會議中伏兵將之射殺。（註四十六）梁氏痛失知友，也少了一個事業上的幫手。嘗謂其在討袁之役中最傷感的兩件事：「父死不克奔喪，且斷送平生唯一之良友，」（註四十七）後者即指湯叡而言。萬木草堂同窗中對梁最

有幫助的，湯氏一人而已，不幸湯早死，否則梁的政治生涯坎坷，或可略為減少。

## 二、青出於藍的後起之秀

### (一) 蔣方震

梁啓超受康門的拖累甚於幫助，但是却得到了學生輩甚大的助益。回顧其早年的春風化雨生活，時務學堂時期最為愉快，也造就了不少人才。不幸自立軍一役，犧牲泰半，至民國而碩果僅存者，一、二人而已。對梁最有幫助的是蔡鍔。他們師生在討袁護國時期合作無間。若非蔡氏早逝，梁的政治生涯，又當是另一種局面。范源廉也是時務學堂的高才生。但范氏在前清仕途上一帆風順，至民國已與梁並駕齊驅。且其性格較之梁氏更為溫和，宦海浮沉，與世無爭，在政壇上與梁為有限度的政友，盡量避免捲入。（註四八）因此，時務學堂受業者直接對其幫助，尤如其萬木同學，十不得一。

對梁最有幫助而頗有影響的，是幾個執弟子禮或界於師友之間的後起之秀。第一位是蔣方震（一八八二——一九三七）。蔣由蔡鍔之介紹而修弟子禮於梁，他們是在東京認識的。這一位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軍事學家，當年若非梁的鼎力，勢難順利進入士官學校。（註四九）而蔣在軍事上的成就，後來對梁則有莫大的幫助。可謂耕耘收穫兩個目的都達到了。

梁啓超在討袁時期始萌芽實力憑藉的想法，所以在護國之役結束後敦促蔡鍔繼續留在四川，冀能控有一省地盤及相當兵力，作為在北京周旋的後盾。不幸蔡一病不起。梁將培植實力的希望轉而寄之於蔣方震。原先蔣氏本可於蔡鍔離川時，間接掌握這一分勢力。但他一定要伴隨蔡鍔赴日就醫，軍隊暫時交給了羅佩金及戴戡。蔡氏病逝，蔣又因他事稽延，未能入川。民國六年，羅、戴先後受川軍壓迫，處境危殆，蔣方震趕往協助。不待抵步，羅已去職，戴續敗北，蔣氏因此失去了掌握兵柄的機會，梁啓超建軍的希望也受了致命的打擊。（註五〇）次年蔣隨梁前往歐洲遊歷，在歐一年，朝夕共同生活，彼此的友誼益為增進。自歐洲回國，共同致力於新文化運動。九年至十一年的聯省自治運動，蔣氏出力最大。（註五一）

蔣方震在從事新文化運動與聯省自治運動之同時，擴大了他的接觸範圍，周旋於吳佩孚、趙恆惕及國民黨之間。湘直戰後的

和平會議，出力不少。十四年十月參與孫傳芳（註五二）反張作霖之戰，吳佩孚乘時復起，聘蔣爲參謀長，合力討伐奉系。（註五三）諸種活動，梁啓超曾預聞其事，認爲這是個人政治的新轉機。伐奉之役，梁氏尤爲關切，是年九月三日他給女兒梁思順的信說：

「百里（蔣方震）現在長江一帶。軍界勢力日益膨脹，日內若有戰事，他便是最重要的一個腳色，因此牽率老夫之處亦不少。他若敗，當然無話可說，若勝，恐怕我們政治生涯不能不復活。」（註五四）

孫傳芳雖於短期之間擊敗了奉軍，控有東南五省，吳佩孚則爲馮玉祥系的國民軍所扼，坐困漢口，一籌莫展，最後不惜與奉系合作，共討國民軍。蔣方震遂與吳佩孚分手，但仍繼續協助孫傳芳。丁文江因他的推介，出任滬甯商埠會辦。

十五年三月，唐生智驅逐趙恆惕，取得湖南政權。唐爲蔣方震的保定學生，謀令與孫傳芳聯好。吳佩孚則助趙攻唐，蔣勸阻無效，正式與吳脫離關係。

不久國民革命軍北伐，唐生智任前鋒。孫傳芳採蔣方震議，主南北軍均不干預湘事，期收漁利。革命軍以破竹之勢，直下湖南，進入湖北，轉向江西，孫傳芳與革命軍決裂。梁啓超於蔣方震的活動及時局的發展，密切注意，在他給子女們的信中即可略窺梗概：

「時局變化極劇，極重要，他（指蔣方震）最得力的幾個學生都在南邊，蔣介石三番四覆羅致他，而孫傳芳又卑禮厚幣要仗他做握鵝毛扇的人。蔣（介石）、孫（傳芳）問所以久未決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蔣軍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國人逼他如此）孫爲自衛不得不決裂。我們的熟人如丁在君（文江）、張君勵（嘉森）、劉厚生（恆）等都在孫幕，參與密切，他們都主戰，百里亦不能立異。現在他已和孫往前敵去了。：這幾天江西的戰爭關係眞重大，若孫敗以後，黃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勢力；（百里當然跟着毀了）若孫勝蔣介石敗，以後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計劃是要把蔣介石與唐生智分開，蔣介石敗後，謀孫、唐聯合。果能辦到此著，便當開一嶄新局面。國事大有可爲，不能不付諸氣數了。」（註五五）

江西大戰的結果是孫傳芳全軍覆沒，蔣方震所圖又成泡影，梁啓超同爲失望。

梁啓超與蔣方震由師生的感情而成爲政治的知己，梁嘗言：「啓超與方震交逾二十年，居同學，出同遊，天下事則同患難。

」（註五六）蔣氏則言：「方震徵先生無與歸。」（註五七）

## （二）張君勱、張東蓀

張君勱（一八八六——一九六九）和張東蓀（一八八六——？）的私交，幾可以孿生兄弟視之，友誼之篤，鮮有倫比者。

（註五八）他們之所以有深厚的友誼，蓋由於學問興趣相近，政治主張一致的關係，（註五九）而最令人樂道的，是二人皆以師禮事梁啓超，且始終如一。（註六〇）

根據目前可見的史料，張君勱與梁的往還較多，對梁的影響似亦較深。君勱二十歲前，讀新民叢報，認爲新民說是「改造國民腦子」的無上良藥，佩服不已。一九〇六年赴日本留學，與梁結識，「雖未執摯於任公門下，然其關係是在師友之間。」（註六一）同年，梁組政聞社，君勱爲活躍之一員，一度回國運動開黨禁事。立憲派有了諮議局爲發展之根據地，君勱卽與吳貫因氏成立「諮議局事務調查會」，發行憲政新聞以支持立憲運動。（註六二）辛亥革命起，主張組織政黨爭取政權，並建議梁與袁世凱提攜。民國二年至五年在歐洲留學，回國之後，敦促梁發表對德宣戰主張，頗對梁的態度有所影響。（註六三）

張君勱與梁啓超的關係，民國八年以後更趨密切。梁歐洲之旅，君勱爲政治隨員。二人對於新唯心派哲學有甚高的興趣，嘗同訪柏格森，倭伊鑑等。又蟄居巴黎郊外鑽研政治學經濟學，「互相師友，互相發明。」由於這一年餘的朝夕共同生活，梁氏歸國後的方針，君勱爲直接之參預者。（註六四）在新文化運動中，君勱與蔣方震、張東蓀等皆爲主要的角色，尤其促成德國哲學家杜里舒之來華訪問，擔任杜氏的講演翻譯，出力最多。十二年的「科學與人生觀」之論爭，丁文江與張君勱雖然均爲梁的至好朋友，但在感情上、信仰上，梁似較傾向於張，他們都是儒家思想的維護者。（註六五）

君勱與梁啓超爲忘年交，故敬之爲師，愛之如父母，他們之間友誼的深度無法探測，但可以從一個實例中去略加體會。十一年秋冬之際，梁在南京講學，因飲酒過量，又感受風寒，醫生宣布其心臟有輕微的不正常現象。君勱適正陪同杜里舒在南京演講，卽強迫梁罷講。梁曾兩次對子女言及君勱「干涉」演講的事。他的戲謔的筆調，流露了他們的篤厚友誼：

「前幾天因吃醉酒；更感些風寒，歸來大吐，睡了半日。君勳硬說我有病：請一位外國醫生診驗我的身體。奇怪，他說我有心臟病，要我把講演著述一概停止。我想我身子很好，一些不覺得什麼，我疑心總是君勳造謠言。那天晚上是法政學校講期，我又去了。君勳在外面吃飯回來，聽見大驚。一直跑到該校，從講堂上硬把我拉下來，自己和學生講演，說是爲國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東南大學的講堂，到講堂門口時，已見有大張通告，說梁先生有病放假，學生都散了。原來又是君勳搗的鬼。他已經立刻寫信各校，將我所有講演都停一星期再說。醫生說，不准我讀書著書、構思講演，不准我吃酒、喝茶、吃烟。：你想這種生活我如何能過得。神經過敏的張君勳，聽了醫生的話，天天和我吵鬧，說我的生命是四萬萬人的，不能由我一人作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萬萬人監督我的權利和義務。：吃醉了一頓酒，被這君勳找着錯處，獸頭獸腦，書獃子又蠻不講理。如此其欺負我。你說可氣不可氣。君勳聲勢洶洶，他說我不聽他的話，他有本事將我驅逐出南京。問他怎麼辦法，他說他要開一個梁先生保命會，在各校都演說一次，不怕學生不全體簽名送我出境。」（註六六）

張君勳認爲中國現代政治的發展，如果孫中山與梁啓超能够合作，必然與現狀有所不同。（註六七）所見未始無獨到之處，亦可以體會其對梁的感情。

張東蓀與梁啓超的關係雖然不如張君勳深，但他們的社會主義觀點接近，且一致主張中國宜先發展資本而後實行緩進的社會主義，形成了「五四」以後溫和派反對馬克斯主義的一大流派。東蓀似因張君勳的介紹而與梁氏結識，所以亦以師禮事之。東蓀的政治主張，在清季無積極的表示，到了民國，一度趨向激進。（註六八）曾在庸言、大中華等雜誌刊布個人的言論。民國六年擔任時事新報總主筆後，聲譽鵲起。由於主持時事新報筆政，甚少有與梁氏共事的機會。惟藉書翰往還，則未嘗中斷。梁於旅歐期間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蓋由東蓀的敦促而來。（註六九）在新文化運動中，東蓀與張君勳負責中國公學的改制，任勞任怨。梁在東南的潛力，以中國公學及時事新報爲根據地，而兩者都與東蓀有密切的關係。

東蓀與梁的友誼，從兩件小事中可以得到見一斑。其一，東蓀的書信不喜附署日脚，梁曾加以責備。（註七〇）其二，東蓀曾鼓勵梁與吳佩孚聯絡。十一年直奉戰後，梁主張恢復舊國會，便與東蓀的鼓勵有關。及後見勢不妙，又勸儘速掩旗息鼓，在致梁的

信中，一開首便說：「公政治與會如何？孫鼓勵公政治與會誠該打！」（註七一）用語親切，非泛泛者可比。

中國何以不需要激進的社會主義，梁與東蓀交換意見最多。梁固然有他的看法，而其「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一文與張東蓀的「現在與將來」互為呼應，若干論點，梁似受東蓀的影響。（註七二）

以上的簡單介紹，說明張君勱、張東蓀與梁啓超的交誼及他們以晚輩身份影響前輩的梗概。由於他們的思想接近，交誼篤厚，梁啓超晚年組織政黨未竟之意，直接間接寄託到他們二人的身上。日後張君勱組織國家社會黨，顯示他們承繼了梁的意志。十七年歲尾，梁氏病篤，君勱上一函請留遺囑之意，語句雖然淒測，却是一件極其嚴肅而重要的文獻，原函如下：

「吾人政治生活不知何日始能復興，凡同志過滬，森（張君勱原名嘉森）輒詢以先生病狀，均謂不輕。森望先生安心靜養，勿再以俗事繁心。國事紛如亂絲，聽吾儕在萬難之中奮鬥可也！森常望於先生者，將先生對於世界，對於吾國，對於舊友之希望，以簡單之言，擇要記錄，俾同人得以繼續先生之志願而已。」（註七三）

這一封信的含義甚多，顯然的，張君勱一輩已承繼了梁的意志。這一派知識分子在民國史上將繼續扮演其所擔任的角色。（註七四）

### 三、結 論

圍繞着梁啓超的師友三代關係，在此僅僅討論了「師生、同學」兩者。討論的動機，在觀察傳統人際關係的延續，現代化人際關係的顯現。傳統的人際關係受情感之約束，現代化關係則以理性為出發點。梁啓超於此二者都體會到了。其師康有為所加給他的是一種情感的壓力。梁啓超自己雖然已經擺脫了若干傳統的觀念，並不能完全擺脫傳統師生情誼的約束，所以他的老師及萬木草堂同學關係，是一大拖累，他沒有得到若何的幫助。但是他的學生輩情況就不同了。蔡鍔、蔣方震、張君勱等人皆各有所長，他們對梁有積極的幫助和影響。這一個三代關係，顯示上一代的康有為是傳統的，梁啓超及其同輩有所轉變而未全變，梁的學生輩則已經走向專業化。代與代的間隔為二十年，清末民初之四十年間，其變遷是巨大的。

個人關係的結合，究竟不如政黨組織的結合；前者止於彼此的照拂，後者則以意識型態為基礎。康、梁在清季有君主立憲的理想，民國肇建，此一理想隨客觀的環境而消失，所以他們退至師生的情誼地步。梁氏與他的學生輩有政黨政治的認識，惜未真正組成一個有理想的政黨，惟他們的人際關係顯然已有所蛻變。

#### 附 註

- 註一 T'ung-tu Ch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 1962) p. 176.
- 註二 Andrew Nathan, "Connections in Chinese Politics: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Kuan-hsi in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972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 註三 「南海先生七十壽言」，飲冰室文集（台北，四十九年版）之四四上，頁二七——二九。
- 註四 「公祭康南海先生文」，同前，頁二九——三一。
- 註五 參看張朋園，梁啓超清季革命（台北，五十三年），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五十八年）兩書。
- 註六 康有為，「救亡論」，不忍雜誌（上海，民國三年本），卷一，頁二十三——三十四；「新中國建設問題」，飲冰室文集之二七，頁二七——四七。
- 註七 某大學一楊姓研究生（姑隱其名）抄了拙著「梁啓超與清季革命」，得了碩士，由講師，副教授而教授，青雲直上，年前竟以「康梁歷力集團對民國之影響」為題，向有關機構申請補助，被駁斥。
- 註八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四十七年），頁三八四。（以下簡稱，丁編，梁譜）
- 註九 同右，頁三四一。
- 註一〇 同右，頁三四二——三四六。Ernest Young, "The Reformer as a Conspirator: Liang Chi-chao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Albert Feuerwerker and all (ed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p. 239-267.
- 註一一 康有為，康南海文集（上海，民國三年），頁五——七。
- 註一二 原函見附錄。
- 註一三 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四九年本），頁五六——五七。
- 註一四 同右，頁六五——六六。
- 註一五 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頁一六——一七。

- 註一六 清代學術概論，頁六三。
- 註一七 丁編，梁譜，頁三七〇。
- 註一八 同右，頁三七一。
- 註一九 同右，頁三七三——三七四。
- 註二〇 同右，頁三八四、三八五。
- 註二一 同右，頁三八八。
- 註二二 「從軍日記」，盾鼻集（台北，四十九年版），頁一二二。
- 註二三 「關復辟論」，同右，頁一一七——一一八；近代史資料（北京，一九六二），第三五號，頁六四——六五。
- 註二四 「反對復辟電」，飲冰室文集之三，頁一六——一八。
- 註二五 經堂，「康有為與梁啓超」，古今月刊，（上海，一九四二年三月）創刊號。
- 註二六 楊復禮編，康梁年譜稿（油印本），下篇，頁四一。
- 註二七 「康有為致王寵惠書」，康有為致諸家函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 註二八 蘇雲峯，「康有為主持下的萬木草堂」，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六十二年）第三期，下冊，頁七五——一〇九；Hau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1) Pp. 40-41.
- 註二九 梁荐入馮國璋幕，（丁編，梁譜，頁四二二）。
- 註三〇 康有為謂袁世凱欲以麥孟華為教育總長。如然，袁氏必然別有用心，或在求得帝制問題之妥協。惟何以未成事實，麥氏的實學似有關係。見康文佩編，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台北，六十一年），頁一三〇。
- 註三一 友人招飲，歸而覺頭痛，二日後逝世，（「祭麥孺博詩」，飲冰室文集之四五，下，頁七四——七六。
- 註三二 丁編，梁譜，頁四四七——四四九。
- 註三三 同右，頁四二四。
- 註三四 同右，頁四二四——四二八；時報二、一〇、一六；二、一一、一五。
- 註三五 丁編，梁譜，頁四二六——四二七。
- 註三六 同右，頁四二七。
- 註三七 張朋園編，「民國職官年表初稿」，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冊，下，頁五七。

註三八 丁編，梁譜，頁四二六。

註三九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台北，四十三年版）（一），頁四一；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頁一七三。

註四〇 宣統二年，梁鼓勵麥孟華讀書，謂：「願一年來與荷公（覺頓號荷丁）同居，雖復遊戲間作，然以學相砥之時多，自覺其心略為著處，寧貼較愈往時。」又謂：「讀書之樂，此荷公所身受，最樂道之者也。」（丁編，梁譜，頁四四七、四四九）

註四一 丁編，梁譜，頁三八三。

註四二 三年八月辭，改任中國生計會會長。

註四三 張一鑾，心太平室集，（台北影印，五十五年）卷四，頁二七。

註四四 胡平生，梁蔡師生與護國之役（稿本）；張朋園，「維護共和：梁啓超之聯袂與討袁」，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期。

註四五 「祭海珠三烈士文」、「番禺湯公墓誌銘」，飲冰室文集之四四，上，頁一二——一五。

註四六 丁編，梁譜，頁四八四——四八五；時報，五年四月十二日以後各日消息及專論。

註四七 盾鼻集，頁七五。

註四八 辛亥革命爆發後，梁欲藉范氏有所聯絡，但范之反應甚屬冷淡，其書云：「來示諄囑，以毋為一局部之事所限，現亦覺株守非宜，已勉擴行動之範圍。惟自愧學識疏陋，不足以勝艱鉅，恐未必能於世事有裨毫末耳。」（丁編，梁譜，頁三六三。）民國初年，范氏著籍進步黨，但無積極之參與。

步黨，但無積極之參與。

見註四四。

註四九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上海，二十七年）頁七三。

註五〇 張朋園，「梁啓超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六卷，第一期（台北，六二年）；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稿本）。

註五一 據一般人的印象，孫傳芳在軍閥中有其可取之處。見童軒蓀，「北洋殘照與沒落的後人」，傳記文學，卷一七，期五（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

一月）

註五二 有謂辛亥革命前，蔣方震在東北不為張作霖所容，見蔣復璁，「先叔百里公年表」，蔣百里全集，（台北，六十年）（六），頁四一——四二。

註五三 丁編，梁譜，頁六八二。

註五四 同右，頁七〇九。按世界書局鉛印本對原文有所改動，此處據監晒本。

註五六 「蔣母楊太夫人墓誌銘」，飲冰室文集之四四，上，頁一六一——一八。

註五七 同右。

註五八

二人同時留學日本，在東京諦閑法師佛學講座上認識，過從甚密。民國年間，嘗共同擔任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雜誌之筆政。二人對新康德學派之哲學均有甚高之興趣。東蓀所譯柏格森的創化論，謂為嚴復以來之首選名筆。十四年以後，二人同執教自治學院（後改政治大學，十六年被封閉）十八年君勳講黑格爾哲學於燕京大學，係東蓀及張嘉璈之推荐。二十年發起國家社會黨（發起者尚有王敬芳、胡汝麟等人），東蓀草黨剛，刊再生雜誌。二十三年君勳講學廣州，陳濟棠約之長廣東民德社，適東蓀來長學海書院，再度聚首，不久東蓀北去，君勳亦赴上海。抗戰起，君勳任國民政府國防參議會顧問，東蓀執教於燕京大學。政府遷重慶，東蓀一度入川，旋又北返，講學北平，言民族大義，日人繫於獄，東蓀絕食不死。日本投降，入川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主張「政治民主，統一和平」，兩人再聚。還都行憲，國共和談不成。東蓀歸咎國民黨，君勳則主張與政府合作。二人政見不同，自此分手。

君勳與東蓀共事數十年，友誼深篤。民國五十四年為二人之八十壽慶，君勳懷念舊友，著「張東蓀先生八十壽序」，情文並茂，茲略引如下：

「大陸淪陷，極權虐政，毒流人神，而余顛沛海外，皤然已老。既傷祖國，復念故人。緬懷昔遊，都如隔世，是為余與東蓀一散不可復聚，將且人天永隔，長無見期，黯然增歎之始。」

中共政權建立後，東蓀任中央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不久中共奪其職，行動不自由。君勳謂此有如哥羅宋（Benetto Croce 今譯克羅奇）之受制於墨索里尼，愛因斯坦之見逐於希特勒。君勳懷念東蓀，引杜甫送孔巢父詩：「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如何？」謂「今日誰復能為余之巢父，足任問訊之勞者耶？而余與東蓀當年攜手一堂，上下議論之樂，寧可再得於今生耶？」君勳歎其與東蓀均為失敗者，因言：「抑余與東蓀者，皆使命失敗之人也，則於茲東蓀覽揆之辰，安忍復辭文正之誥，不一吐余二人生平之素，失敗之衷，與夫東蓀今者荆天棘地無所告訴之苦，於以訴之人類理性，訴之正義公道，訴之後世史家，一共評其是非曲直耶！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自由鐘，卷一，期三；轉見，再生，台字卷一，期二，六十年九月）

註五九 晚年因所選擇之合作對象不同而分手，見前註。

註六〇 惟據蔣勻田云，北伐軍攻克武漢，君勳曾前往觀察，回到上海發表「武漢見聞錄」，對革命軍之新氣象頗有所稱讚，因此引起梁的誤會，認為君勳已向國民黨靠攏。事後誤會亦冰釋。（蔣勻田，「張君勳先生一生大事記」，傳記文學，卷十四，期四）。

註六一 張君勳於五十二年在香港新亞書院講評梁之清代學術概論，言及彼此之交情。（程文熙，「張君勳先生與梁任公先生」，再生，台卷三期十五，民國六二年元月）。又梁撰「張潤之先生（君勳父）六十雙壽并序」（飲冰室文集之四五，下，頁七九——八〇）亦可略見

他們的友誼一斑。

註六二 詳張明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頁一八二——二〇〇。

註六三 丁編，梁譜，頁三七二——三七三，四〇二——四〇三。

註六四 丁編，梁譜，頁五七〇——五七二。

註六五 韋政通，「儒家在現代中國的『挫折』與『重建』的檢討」（稿本）。

註六六 丁編，梁譜，頁六二五。

註六七 Carsun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 C., 1952) p. 45.

註六八 與陳獨秀等馬克斯主義者一度有所往還。後因不滿唯物史觀而退出。見 H.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 Y., 1967-1971) under Chang Tung-sun.

註六九 參看張朋園，「梁啓超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及中國現代化的見解」，食貨，新三卷，第十期（六十三年一月）。

註七〇 丁編，梁譜，頁六〇六。

註七一 同右，頁六一六。

註七二 兩文均首見於改造雜誌（卷三，期四，期六，民十年一至三月）。

註七三 丁編，梁譜，頁七七三。

註七四 國家主義派之曾琦，亦執弟子禮於梁。梁一度曾將政黨希望寄託於少年中國學會。十六年曾琦欲聯合張君勱組成一黨，共奉梁氏爲魁，惜不久梁逝世，事遂不成（丁編，梁譜，頁七二九——七三一；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九章，傳記文學，卷二十二，期三）

附錄：

梁啓超致康有為書（註）

夫子大人函去方馳昨歸於損 今猶快寫途旅則  
範明遠之古樹寒蓬高以身世則邱希範之驚飛  
草長行路闕之程將感歎而况弟子弱歲奉手半生同  
患自非木石能勿惻壺入冬以還念我土宇傷心如擣雜  
復老萊翁保強為憶嗟北海傾尊尚雜杖履及  
至屏動輒自獨居深念未嘗不怫特激其發且求  
自試稍象索淡思不曠墨闕矇井三祝波舟忘  
履矧以感年久盜時譽逼若凡會為世具瞻豈具  
偷蕙而思自絕委輿爾於草芥憚極溺於援手者  
然而上察天時下審人事靜去作凶信而有微安得

猶素位居易之訓守潛注无問之戒夫任天下者苟  
犯險難固也然九敗而冀一成艱可靡恤糜項而利  
天下險可毋避若乃湛溺自殊而以示勇抱薪救火  
而方致其智者不為仁者不為夫以卒初健者城府  
森峻自深家工好臣所教豈其護是智不如葵而乃  
欲與狐得皮過猿緣木安由心傾但一逝豈冷子胥也  
可為信讞斯所未喻一也又以河北諸將保塞羣酋卷  
上之舊寇不忍首履里運臂拒俾為捍城終而一關  
之壑搏沙易散村循非素背以誰與欲以見放湘累  
坐譴西伯撻尼父之應躬台慕劉季之奪位軍斯

所不啻也。舊朝典軍一二狂士，羊很狼貪，為國妖  
孽。三家磔案，十刀剝莽，匪惟衆怒，實上私仇。今欲有  
事於北廷，且必與為儔。就令收斂弛之用，詎能馳驅  
以忍以傾城之姿，自蒙不潔，况乎趙愷一建，舉國皆  
敵。內則冢中枯骨作魑魅之喜人，外則江東獅子弄  
犀，盲目而吠。影于夫所植，無疾而死。宣慰之玉親戚時  
之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三也。龕暴臨地，保境付時  
闕。在實，駢錢之唐武肅存為上，以無侯煩言，能急首  
毋以既有待於臣，佗就彼黃金，全漢難期於五利。雖  
公存生，哺哺不遠，嫌而傳矣。錢神空勞，若論說

食之自得飽作簡祇若自纏斯所未喻四也夫極大  
難者不徇小节懷遠猷者不辭近怨若保大定功於  
物有濟即物驅德譽義我於古為然自孫權中大  
江東呂蒙非復學下宛城之利彼此共之急奮之形  
相信程未豈得以如陵之甲狎彼制挺而觀愈風  
之激送此例也既勢能於攻心終技窮於畫日之若  
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五也且西靜而不可動者民情也  
可乘而不可抗者時勢也十年以來人咸思漢百日  
之內運轉三朝既此一朝一夕之故又豈一手一足之五  
黨風懷投鼠去羗之憂因之遺整斯朕之勇脫

移突之見納信補牢之可期今事勢既移前塵  
成幻匪直留此虛寇不孫已亂正以強荏射的並用  
獎爭就合北方之務可實得勇南風不競所出喪  
師然接臂者徧閩左輟耕者闐隴畔乃士備炊  
爭歌小戎國殤半為汪鑄嗟此血肉之軀孰允載  
軒之亂其至固不可及在戎乃所為矜豈以室馬之  
在羣而謂禽猶為考理夫豈徒所志宵札旌亂計  
之以武亂且益滋更閱歲時伊於胡底而帝同酷死  
漁人利焉斯所未喻六也徐諸大理還觀我生既未  
容舖糟吸醕又安可揚湯止沸故乃聞事文酒毋以不

不損年重理丹鉛庶幾明夷結訪豈不巧進蓋多  
苦心如茶療飢匪亦人喻抱璞去脏終不但悔今  
茲我國警彼中流若豈割於見瓦全無翼則事危  
雖欲焦頭爛額為事已遲亡國之辜當與君期君  
相射軍士夫共分之若幸之難遭難之勢或享夫馬之福  
則弱才菲國豈患無塗錯節方多索陶宜亟與子  
所就之自勉而欲與出丈夫共之者可若承逆性之誠  
惟後時之戒斯同一義我豈敢竊訛惟揣駑駘不任  
驅策趨舍異路悵悵何言窮歲逼迫百端之集荒  
園易主繞樹無依暫寄備椽月日而已吾師使債

庶以相根絕頂完領湖山六河少佳趣但苦細弱重  
累慮難移業相就睽茲多感我勞如何尊守札已命  
兒曹寫副分畀君勉務博想同茲惻也

臘不考十日予子啓超自京上書

註：函署「臘不盡十日」，按內容應為辛亥年十二月二十日，即民國元年二月七日。此時康為有居日本廂根，梁啓超在神戶之須磨。